

## 从中西礼仪之争看中国现代启蒙

胡晓利 (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

**提要:** 中西礼仪之争是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引发的一场争论。其争论的焦点是祭祖、祭孔、祭天等中国习俗是否违背了天主教的原则, 针对中国物貌风俗的特殊情况是否应该采取容忍政策。罗马教廷及各方激烈争论, 着力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但终究没有找到一个和解的办法, 最后以双方的互不妥协落下帷幕。礼仪之争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前奏曲。彼时, 中国尚能作为平等的一方与之辩论, 并做出相应的禁教举措。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已经丧失了行使自由意志的条件, 一味被世界局势裹挟前行。从表面上看, 礼仪之争是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宗教与习俗冲突, 其波及的范围也仅限于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之中, 但它实际上反映了更为深层的文化问题。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于其他文化的完备系统, 有其自身运行的逻辑, 与西方文化相遇时, 中国文化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惯性冲劲, 带有非常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隐藏在礼仪之争底层的是更为广阔的文化思维模式的冲突, 正是这些难以调和的因素导致了启蒙的阻碍。因此, 本文将从这场礼仪之争的面相中探讨中西双方思想的深层结构, 两种文化的碰撞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未来的启蒙之路也许可从窥知一二。

**关键词:** 礼仪之争; 启蒙; 宗教; 文化; 冲突

**作者简介:** 胡晓利 ( 1992-11-08 ), 女; 汉族; 籍贯: 湖北汉川; 邮箱: 986102471@qq.com; 电话: 13697349649;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地处东亚, 在传统时代, 四周都没有高级文化可以与之抗衡, 因此很自然地自成一个“天下”, 居于世界之“中”, 与四裔的关系是人类唯一的文明与非文明的关系, 而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sup>1</sup>。由于地理环境, 山川阻隔, 中西之间的交通必须要借助一定的物质文明才能形成气候。明清时期, 西方社会已完成一系列变革, 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 航海大发现,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向外扩张 ( 无论是文化的还是地理的 ) 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趋势。而彼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耕社会, 到了晚清, 普通民众的生活愈加穷困, 社会已出现很多动荡不安的因素。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在此时相遇, 冲突在所难免。中国作为弱势被动的一方, 不得不忍受其后果, 马克思说: “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sup>2</sup> 西方强制介入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极速变迁, 无疑造成了中国人心理和文化双重性创伤。16世纪, 自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 西方传教士开始络绎不绝地踏入东方这片土地,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思想。“西学东渐”的风潮开始逐渐形成, 至康熙为一“高潮”, 一直持续到现在。17世纪, 天主教内部开始了一场关于中国礼仪的论战。17世纪末, 罗马教廷开始频繁介入在华传教士的“礼仪之争”。1710年以后, 罗马教廷多次发布礼仪禁令, 禁止中国教徒拜孔、祭

1 (美) 孙隆基 Longji SUN: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Zhongguo wenhua de shenceng jiegou ) 【The Deep Level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e】. 桂林 (Guili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05.第 372 页。

2 (德) 马克思 (Marx Karl Heinrich), (德)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 ( Makesi Engesi xuanji )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les]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第2卷·第2页。

祖。1723年，雍正继位，次年，清廷下令，在中国全面禁教。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后，史称“百年禁教”。大批外国传教士遭到驱逐和逮捕，中国教徒亦受到牵连与打压。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使得清政府被迫开通五个口岸，正式允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从此，中国开始汇入世界大潮。

## 一、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个体经验的绝对化

实用主义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最初的意思是“行动”，后来又派生出“实践”的含意。1878年，美国学者皮尔斯首次将“实用主义”用于他的哲学论文中，此后，历代哲学家不断对“实用主义”这一概念做更为深入地解读。总体来说，西方语境下的“实用主义”包含对深层实在和物质性实体的探究，是一种哲学方法。涂尔干认为把内心中的思想、内心之外的实存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就是实用主义的根本观念<sup>3</sup>。欧洲学家陈乐民先生认为中国人根本不懂得在物质以外还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的、无限的、超验的精神实体，中国的“天”是一个物化概念，宋儒的“理”和“气”都是物质的<sup>4</sup>。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认为基督教之所以没有被中国吸纳，是由于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基础层面存在差异，他认为，汉语词汇不能表达“being”或“essence”这类概念<sup>5</sup>。缺乏内心之外的实存概念导致中国人囿于现世的物和人，结果就往往容易忽视与物质截然不同的精神实体，难以超拔到纯精神信仰的层面。

中国没有纯精神信仰的传统和与之配套的宗教组织机构。在传统社会中，士阶层的思想信念主导着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和尚和道士并非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都在世俗生活中扮演着各阶层的辅助角色，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用。士阶层的思想是由儒家和统治者所塑造的，一方面，他们依附于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借助于权威使自己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权威阶层。古代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乡土社会，人附着于土地之上，人口流动较小，生产方式单一。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仅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sup>6</sup>。

孔子拒绝探讨未知的、不可把握的事物，很大程度上为宗教信仰留下了空间。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文化讲求经世致用，中国人重现世、尚事功，在衣食住行方面都表现出活色生香，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样态。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形成“灵魂”的观念，儒家的天命是道德的而非宗教

3 （法）爱弥尔·涂尔干（Aimé Turgan）[Émile Durkheim] 著；渠敬东 Jingdong QU 译.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Shiyong zhuyi yu shehuixue [Pragmatism and Social Theory]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00.第30页。

4 陈乐民 Lemin CHEN 著.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Kande shi Ouzhou, xiangde shi Zhongguo [What one sees is Europe and what one thinks about is China] [M]. 北京 Beijing: 东方出版社 Dongfang chubanshe [East Press], 2020.01.第107页。

5 （美）孟德卫 Mengdewei [David E. Mungello] 著；汪文君 Wenjun WANG, 姚霏 Fei YAO, 丁留宝 Liubao DING 等译. 1500-1800 中西方的伟大相遇 1500-1800 Zhongxifang de weida xiangyu [The Great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M]. 北京 Beijing: 新星出版社 Xinxing chubanshe [New Star Press], 2007.02.第82页。

6 费孝通 Xiaotong FEI 著；刘豪兴 Haoxing LIU 编. 乡土中国 Xiangtu Zhongguo [Countryside China] 修订版[M].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3.10.第48页。

的。儒家的一大历史功绩在于它使中国避免了宗教，但是儒家那种过于重视伦理实践的精神，同时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sup>7</sup>。基于偶然性和个体经验的科学始终停留在技术层面，它与农耕社会的发展样态相适应。

中国传统实用理性过于重视现实的可能性，从而经常轻视和贬低“无用”的抽象思维<sup>8</sup>。中国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们只能理解亲眼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从不细究任何因果关系<sup>9</sup>。一直以来，中国宗教信仰被实用化，成为帮助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工具。求神拜佛者希望借助超自然的力量解决在此岸世界的种种苦恼，而传教士带来的是一种超世俗的、一以贯之的宗教信仰，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

相较而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更像是一种保险思维，多多益善，各类民间崇拜神之间并不相互冲突。坚定的有神论与模糊的泛神论两种思维模式运行不悖，有各自一套维持平衡的逻辑与机制，一旦两种思维碰到一起就必然不能直接相容。当天主教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正是以多一重保险的心态来接纳天主教的。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曾在日记中写到：“中国人是我所见过最为麻木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能得到什么吃的或者我们能得到什么喝的？我们能有钱买衣服穿吗？”<sup>10</sup>

相比于求知之真，中国人更加追求道德之善，一旦客观事物发展的结果偏离了预期，甚至背道而行时，人们习惯诉诸于道德谴责。如遇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将之解释为“天谴”，从而放弃把握自然界的可能性。“天”代表着最高的道德，不可侵犯的权威，“天子”、“替天行道”等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而产生。许多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中国人仍然保留着这一思维惯性，以至于把两件毫无因果推导的事件联系起来以解释出现的“恶”的结果，称之为“报应”，表现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一种无能为力的麻木不仁。佛教这个外来的信仰在透过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变压器，落实到民间后，就变成在现世中“做人”的报应观念<sup>11</sup>。

1793年，英国遣使觐见乾隆皇帝，欲与中国通商，建立外交关系，乾隆敕谕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以一种“天朝大国”的心态拒绝了一次可能避免鸦片战争的机会。外交使臣马戛尔尼很快发现中国的物质文明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提出表演欧洲新式火器，这本是了解西方军事力量的一个好时机，但是中国方面表现麻木，一律以唯唯否否置之，和珅更是直言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7 何兆武 Zhaowu HE 著. 冲击与反响 Chongji yu fanxiang [Impact and Repurcussions] [M]. 上海 Shanghai: 学林出版社 Xuelin chubanshe [Xuelin Press], 2020.01.第92页。

8 李泽厚 Zehou LI;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Shiyong lixing yu Legan wenhua [Practical Reason and Happy Culture] [M]. 北京 Beijing: 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 [Sanlian Bookstore], 2005.1.第12页。

9 (美) 明恩溥 Ming Enfu [Arthur Henderson Smith] 著; 王怡 Yi Wang 译. 中国人的气质 Zhongguoren de qizhi [Chinese Charcateristics] [M]. 北京 Beijing: 电子工业出版社 Dianzi gongye chuban she [Electronic Industry Press], 2015.05.第62页。

10 (英) 罗夫·华德罗·汤普森 Luofu Hualuode Tangpusen [Ralph Wardlaw Thompson] 著; 赵欣 Xin ZHAO、刘斌斌 Binbin LIU 译; 杨格非 Gefei YANG: 晚清五十年 Wan Qing Shiwunia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years in China] [M]. 天津 Tianjin: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Tianjin people press], 2012.6. 第41页。

11 (美) 孙隆基 Longji SUN 著.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Zhongguo wenhua de shenceng jiegou [The Deep Sr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e] [M]. 桂林 Guili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05.第55页。

中国官员虽然对西方的科学兴趣索然，却好奇这个来自泰西的洋人能否面相，推算吉凶。由此，马戛尔尼得出结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研究的精神是因为科学不容易出成绩而且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实用，所以中国政府不以科学为人生所急，而对西洋物质上之进步亦以此一概抹杀。”<sup>12</sup>

儒家致力于人伦秩序的协调，最在乎人与人的关系，而无“人神关系”的理念。每个人所属的等级地位通过“礼”得以体现和规范，正是这样一种尊卑上下有别的理论机制，使得中国社会能够平稳运行两千多年，如果没有西方世界的冲击，中国很可能依然按照原来的轨道自转。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从全世界来看，宗教问题主要包含思想意识分歧和政治斗争。但是中国人对天主教的态度还隐含了一种天朝大国心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外族排斥在“礼”之外。

在一个次序差等十分明确的社会里，向外求取的冲动遭到压抑，于是内求成为一种趋势。在先秦儒学那里，“内圣”与“外王”基本上是有有机统一的<sup>13</sup>。内圣外王是历代儒士孜孜追求的理想人格，对社会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自唐朝灭亡以后，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中国士大夫的人格逐渐开始转向内心，从一种“内”与“外”平衡的状态走向失衡。陆九渊认为：“精神全要在内，不要向外，若在外，一生无是处”，程朱也持有同样的论调：“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徒”。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不断向内用力的人生，因此，往往容易忽视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原因，缺乏对现象背后客观规律的把握。当人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的时候，人会改变或重塑客观环境以满足自己的欲求，反之，人则会压抑自己的欲求以适应外部环境。近几年中国社会中出现“内卷”和“躺平”的现象，也正是基于此类心理。

在中国社会中，各种宗教、民间迷信等可谓是五花八门，只要不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有一些甚至可以帮助统治者巩固地位），官方都不会干预。因此，当利玛窦来到中国时着儒冠儒服，采取“合儒排佛”的适应策略时，受到了皇帝的准许，包括之后清代康熙采取的容教政策，对传教士们都礼遇有加。但是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信息沟通越来越频繁，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14世纪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是西方人认识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尚且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度，但当时利玛窦已经指出中国人具有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优越感。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认为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幻灭是基于另一本著作，晚清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此书颇具影响力。他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十分贫苦落后的国度。此时的西方已迅速崛起，对于之前为了在中国传教而附会中国文化，迁就中国礼仪的做法势必不能再忍。

12 马戛尔尼 Magaerni [George Macartney] 著，刘半农 Bannong LIU 原译，林延清 Yanqing LIN 解读。一七九三乾隆英使觐见记 Yiqijiansan Qianlong Ying shi jinjian ji [Mission to China in 1793] [M]. 天津 Tianjin: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Tianjin people press], 2006.05.第207页。

13 朱义禄 Yidi ZHU. 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 Shiqu de qimeng: Ming Qing zhiji qimeng xuezhe de wenhua xintai [The Lost Enlightenment: The cultural mentality of enlightenment scholar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 郑州 Zhengzhou: 河南人民出版社 Henan renmin chubanshe [Henan peoplepress], 1995.04.第206页。

对于宗教问题，国人至今还没有超越功利主义的范畴。“泛神论”、“无神论”与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思想结合，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迷信行为。因而，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与物欲紧密相连的功利主义。试图在现实与精神的灰暗地带寻找超自然的力量，以克服个体的有限性。顺治皇帝觉得汤若望等人有技术知识，他们凭借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对日月食等天象进行预测，比中国旧法准确，而天象变幻每每被视为卜祥瑞、问吉凶的症候，事关朝廷兴衰，这是汤若望等人受到重视的原因<sup>14</sup>。统治者对于传教士的青睐也无非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目的。

## 二、从偶像崇拜到打倒孔家店——炸毁氏族血缘的企图

天主教崇拜唯一的真神——上帝，反对其它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其教义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上帝是唯一的权威。圣经记载：“不可跪拜偶像，也不可屈从于引诱去敬奉偶像”，宗教改革者路德指出“偶像就是假神”。路德强调每一个体的灵魂直面上帝获得拯救，理性也正是上帝赋予人的。上帝把动物性的人提升到具有神性的生命体，因为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中独有人具有上帝的特征。这种特征并不是指外貌特征，而是形而上的理念世界所具有的力量。

圣贤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与圣贤崇拜相适应的是祖先崇拜。儒家在众多的理想人格范型中，以圣人为最高标准<sup>15</sup>。儒家的“圣人”是全善、全知、全能的。天主教却强调只有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对教徒而言，人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上帝，只有通过正确的行动无限靠近上帝。在西方历史中，皇权长期被置于教权之下，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斗争，为民主社会的建立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相较之下，自秦始皇，中国几千年社会中只存在一种权力，那就是至上而下的皇权，在明清两代，这种权力更是达到高峰。

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西方已经开启了去权威化的时代，怀疑一切，甚至上帝也被赶下权威的宝座，理性本身异化为另一种权威。以至于现在西方社会抛弃了上帝这个绝对者，人及其权利和主观能动性、理性与感性都出现了无限被夸大的倾向，人的权利被过分抬高<sup>16</sup>。任何行为和风俗的改变都是以思想观念的改变为前提。马克思在《家庭、国家、私有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古希腊人早在城邦时代就已经炸毁了氏族血缘的关系，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直至个体从家庭血缘关系中脱离出来，才有了平等、自由的普遍价值观。皇权时代，中国社会结构稳固，小农经济依靠血缘关系得以维持，组成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

14 陈乐民 Lemin CHEN 著.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Kande shi Ouzhou, xiangde shi Zhongguo [What one sees is Europe and what one thinks about is China] [M]. 北京 Beijing: 东方出版社 Dongfang chubanshe [East Press], 2020.01.第27页。

15 朱义禄 Yidi ZHU. 逝去的启蒙: 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 Shiqu de qimeng: Ming Qing zhiji qimeng xuezhede wenhua xintai [The Lost Enlightenment: The cultural mentality of enlightenment scholar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 郑州 Zhengzhou: 河南人民出版社 Henan renmin chubanshe [Henan peoplepress], 1995.04.第353页。

16 黄保罗 Paulos Huang.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与现代性的开启 Mading Lude zongjiao gaige yu xiandaixing de kaiqi [The Religious Reformation of Martin Luther and the Staring of Modernity][J]. 宗教学研究 Zongjiaoxue yanjiu [The Study of Religions], 2022, (02):202-210.

礼最初写做“豊”，并不是现代汉语中文明、礼貌等含义，而是指祭神、敬神的一种仪式<sup>17</sup>。由敬生畏，中国的权威主义崇拜是基于传统累积的文化保守主义土壤，一种面向过去追寻答案的心理态势。中国人有“死亡崇拜”的倾向，祭祖是回溯生理上的本源，拜孔则是找回原初的心理寄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人祭祀是导致祖先成为“孤魂野鬼”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对子嗣的执着，对祭祀的重视都可以在此得到合理解释。

血缘、家族、宗法是维系整个社会生存与社会活动的纽带，宗法家族制度以其适应中国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在机制而有顽强的生命力<sup>18</sup>。儒家的文化设计，真正在传统中国形成制度，并发生巨大深远影响的是中国的家庭，或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家族制度<sup>19</sup>。远在罗马的教廷没有意识到，禁止教徒“拜祖祭孔”的宗教禁令，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礼仪的范畴，它触及到中国人的心理构造，冲击着封建社会的堡垒，造成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了克服个体的渺小和孤独，个人需要寻找一个可以融入的权威团体，并从属于它。氏族血缘恰好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归属，通过祖先崇拜，个体和先贤们融为一体，获得力量，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荣光。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感到个人终究是短暂的、虚无的，氏族血缘却是真实的、永恒的，这样一种关系倒错的心理结构使人趋于刻板保守，难以逾越思想的樊篱。

圣人崇拜观念的根深蒂固，在国民的心灵中始终弥漫着浓厚的圣化氛围，孔子成了权威主义的象征<sup>20</sup>。当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指出孔子只是凡人，耶稣才是圣贤时，引发了强烈众怒，他们表示宁愿追随孔子到地狱，也不愿意跟随基督上天堂<sup>21</sup>。祭祖拜孔的行为把逝去的祖先和孔子都当成绝对不容质疑的偶像，千百年来沉淀于中国人的血脉中，这种传统不可能被任何教义粗暴打断。

由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中，一切可能引起秩序破坏的因素都会被遏制。彼时的中国之“礼”并不是靠外在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sup>22</sup>。这种力量不会因为一场革命被摧毁，在社会变革后，它会找到另一块土壤生存下去。无论现代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们依然坚信圣人之言、祖宗遗

17 费孝通 Xiaotong FEI 著；刘豪兴 Haoxing LIU 编。乡土中国 Xiangtu Zhongguo [Countryside China] 修订版[M]。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3.10.第62页。

18 朱义禄 Yidi ZHU. 逝去的启蒙: 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 Shiqu de qimeng: Ming Qing zhiji qimeng xuezhede wenhua xintai [The Lost Enlightenment: The cultural mentality of enlightenment scholar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第83页。

19 金耀基 Yaoji JI 著。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 Zhongguo wenming de xiandai zhuanx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广州 Guangzhou: 广东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Guangdong people press], 2016.03.第68页。

20 朱义禄 Yidi ZHU. 逝去的启蒙: 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 Shiqu de qimeng: Ming Qing zhiji qimeng xuezhede wenhua xintai [The Lost Enlightenment: The cultural mentality of enlightenment scholar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第354页。

21 (英) 罗夫·华德罗·汤普森 Luofu Hualuode Tangpusen [Ralph Wardlaw Thompson] 著；赵欣 Xin ZHAO、刘斌斌 Binbin LIU 译；杨格非 Gefei YANG: 晚清五十年 Wan Qing Shiwunia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years in China] [M]。天津 Tianjin: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Tianjin people press], 2012.6. 第41页

22 费孝通 Xiaotong FEI 著；刘豪兴 Haoxing LIU 编。乡土中国 Xiangtu Zhongguo [Countryside China] 修订版[M]。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3.10. 第49页。

训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性，所谓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即使个人出于宗教信仰的需要，遵循不崇拜偶像的要求，也会招致非议，最终迫于家庭氏族的压力而放弃宗教信仰。如果社会结构是屈从于权威的结构，那么社会成员的上帝概念就往往是儿童式的、远非成熟的概念<sup>23</sup>。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天下为皇帝一家一姓所独有，“家天下”观念有着强大的思维惯性，绝不是简单的斥骂就可以驳倒的。从此种意义看来，远在罗马的教廷频频介入中国的礼仪之争，在不甚了解中国风俗人情的情况下，缺乏容纳和吸收异文化的雅量，企图用天主教义“炸毁”维系中国社会运行的纽带，以符合宗教教义这一行为，在中国人眼中无疑是野蛮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因而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彼时传教士所传播的仍然是中世纪的天主教，而不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所以仍然带有独断专制的色彩，当宗教权利在西方已经走向衰落的时候，罗马教廷在中国仍然表现出十分集权化的倾向，清廷统治者已经隐约感到危机。事实上，对政治颠覆的畏惧始终贯穿着每一位封建专制者，这一点由明清两代越演越烈的文字狱就足以证明，清朝由做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其防范之心自然更重，排除异己的手段也更为残酷。康熙多次颁发谕旨与罗马教廷争锋相对“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

儒家所提倡的孝道是一套逻辑自洽的伦常秩序，它包含了“天命”、“道德”、“礼法”等。从“亲亲相隐”到“二十四孝”再到鲁迅对“孝”文化的评判，孝道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的亲属关系，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都有其独特的功能性，通过祭祀祖先得以维系加强。“孝”要求个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规训与服从，传统的威权主义伦理学以服从为最大的善，不服从为最大的恶，视反抗为不可宽恕的罪行<sup>24</sup>。

尼采曾在街上看到一个小贩手中的气球被狂风吹走，说出一句：“That will fly, flies at last”（要飞的，终将飞走），意指他和母亲的分离。如果一个人不从对母亲、氏族和家庭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如果他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依附于一个赏罚分明的父亲或其它权威，那么他就不能发展出成熟的爱和理性<sup>25</sup>。祖先崇拜制度是中国人被迫承受的最为沉重的负担，活在世上的几亿中国人，被死人所统治，活在当下的人，被过去许多代死去的人所束缚<sup>26</sup>。晚清传教士明恩溥认为祖先崇拜不被放弃，基督教便永远无法引入中国。他站在传教士的立场上，看到了晚清的贫弱和落后，不免带有西方主义的傲慢，虽然当时礼仪之争早已结束，但由此可以看出它引发的思考和震荡依然存在。传统的社会结构及

23 郭永玉 Yongyu GUO 著. 孤立无援的现代人: 弗罗姆的人本精神分析 Guli wuyuan de xiandai ren: Foluomu de renben jingshen fenxi [The Isolated Modern Man: Fromm's Anthropocentric Psychoanalysis] [M]. 武汉 Wuhan: 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 [Hubei education press], 1999.11.第167页。

24 郭永玉 Yongyu GUO. 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 Foluomu renbenzhuyi jingshen fenxi de qimeng iazhi [The Enlightenment Value of Fromm's Anthropocentric Psychoanalysis] [J]. 心理学报, 2022, 54 (02): 205-218.

25 郭永玉 Yongyu GUO 著. 孤立无援的现代人: 弗罗姆的人本精神分析 Guli wuyuan de xiandai ren: Foluomu de renben jingshen fenxi [The Isolated Modern Man: Fromm's Anthropocentric Psychoanalysis] [M]. 武汉 Wuhan: 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 [Hubei education press], 1999.11.第166页。

26 (美) 史密斯 Shimisi [Arthur H. Smith] 著; 龙婧 Jing LONG 译. 中国人的脸谱 Zhongyoren de lianou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08.第158页。

其文化惰性依赖于偶像崇拜得以稳定运转，同时，它大大抑制了国家的正常发展，使了大众处于长久的蒙昧状态。

更为致命的是中国人把一切关系都血缘化的倾向，通过某种方式（利益、价值观捆绑）缔结血缘关系，如桃园三结义、梁山好汉，皇帝与子民，父母官与百姓。在泛血缘的关系里，中国人表现出各种美德，如同情、义气、宽容等，极力将自己消融于他人的情感中。反之，对血缘关系之外的人则表现出冷漠，麻木，刻薄。近几十年的现代化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以传统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却遭到濒临瓦解的危险，导致很多现代人的精神状态陷入危机，蜻蜓点水式的闲谈，娱乐至死的狂欢，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填补了生活的迷茫与空虚。

直至今日，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广袤的农村还是一个以血缘远近决定亲疏关系的人情社会。资本市场的建立基于契约，人情关系对市场的自由发展具有一定的干扰性。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sup>27</sup>。一切进步性社会的特点，都是人生依附或身份统治的消失而让位给日益增长的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sup>28</sup>。近年来，引发热议的年轻人“断亲潮”现象，正是基于年轻一代试图摆脱血缘羁绊的企图。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被明确地提出来。五四青年们急于埋葬过去，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然而事实证明旧的传统不可能被粗暴地割裂。传统文化遗留的权威主义特征使其自身陷入了怪圈，因其缺乏推陈出新的能力而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出现周期性的“文化危机”和“国学热”。回顾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无论是树立权威还是打倒权威，都已经成为专制主义的护身符和文化发展的障碍。

### 三、中国的启蒙与未来——会通以求超胜

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往的催化剂，天主教自诩为“万国宗教”，中国人口较密集而没有信仰上帝的根基，对于传教士而言，中国人是一群尚未认识上帝的异教徒，因此，中国是一个绝佳的福音传道场所。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根本职责是传播福音，而非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点常被学者们所忽视。作为吸引人关注天主教的手段，利玛窦带来了一些西方新奇的物件，徐光启正是在感受到了西方科学的力量而与利玛窦来往甚密。尽管中国和西方世界早有往来，但只限于区域性的传教和贸易，鉴于当时的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中西的文化交流是局部的、有限的、常常被误读的。

徐光启是中西会通第一人，他不仅皈依了天主教，而且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作为中国人翻译的第一本西方科学类书籍，它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徐光启

27 费孝通 Xiaotong FEI 著；刘豪兴 Haoxing LIU 编. 乡土中国 Xiangtu Zhongguo [Countryside China] 修订版[M]. 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3.10.第69页。

28 何兆武 Zhaowu HE 著. 冲击与反响 Chongji yu fanxiang [Impact and Repurcussions][M]. 上海 Shanghai：学林出版社 Xuelin chubanshe [Xuelin Press], 2020.01.第178页。

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sup>29</sup>当代中国，启蒙还没有完成；威权主义仍然大肆横行；本土文化难以完成对异文化的批判和吸收；国家内部和外部的信息流通依然存在诸多障碍。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启蒙不可能原样照搬西方的启蒙。西方经过宗教统治的中世纪，开始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这种一环套一环，螺旋式推动社会上升的发展，是中国所不具备的。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处于农耕文明的中古社会，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有一套可遵循的社会规范。任何逾越这些社会规范的人都会被看作“非人”，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因此，难以出现一系列发展性的社会变革。但是中国不可能走一条完全不受西方影响的启蒙之路，因此，启蒙不仅需要思想上的自由流通，更需要开放包容的心态。

其次，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基础，而这两者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陌生的。欧洲借助古希腊的自由、科学、民主精神和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理性精神，开启了西方现代化之路。反观中国，纵使有“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但主导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思想却是儒家。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四大发明，却没有产生现代化。尽管有一些学者认为早在宋明时期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早于西方，但是从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遭遇来看，中国是与西方接触后才开始现代化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科学技术和儒家学说都为宗法服务。科学技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有限经验，被限制在形而下的范围内，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

再次，传统文化与现代启蒙绝不是二元对立的。启蒙并不排斥传统文化，也不强制与过去的一切决裂，而是有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sup>30</sup>。中国人没有办法对传统文化实行“精神性断乳”，因此，中国文化缺乏一个向“现代性”转化的心理过程，犹如一个老气横秋的儿童。当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成员自我意识得不到充分发展，也就是停留在童年时代，不能将个人自由和独立置于优先地位，而是集体性地认同自己的民族，就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sup>31</sup>。现代化带来的阵痛迫使人们不得不回到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慰藉，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人们习惯将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归结为西方文化冲击带来的后果。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的一百多年之前，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落日余晖般的颓势。大清帝国与欧洲帝国主义相撞，其胜败荣辱几乎是完全可以预见的<sup>32</sup>。礼仪之争成为中西两种文化必然会产生冲突的试金石。中方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使摇摇欲坠的清政府雪

29 陈乐民 Lemin CHEN 著.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Kande shi Ouzhou, xiangde shi Zhongguo [What one sees is Europe and what one thinks about is China] [M]. 北京 Beijing：东方出版社 Dongfang chubanshe [East Press], 2020.01.第 142页。

30 康德 Kangde [Kant] 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Huida zhege wenti, shenme shi qimeng?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 Was ist Erleuchtung?] 中最为振聋发聩的口号“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性”。

31 郭永玉 Yongyu GUO. 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 Foluomu renbenzhuyi jingshen fenxi de qimeng iazhi [The Enlightenment Value of Fromm's Anthropocentric Psychoanalysis] [J]. 心理学报, 2022, 54 (02): 205-218.

32 金耀基 Yaoji JI 著.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 Zhongguo wenming de xiandai zhuanx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 广州 Guangzhou: 广东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Guangdong people press], 2016.03.第62页。

上加霜，同时也严重挫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国人不得不抛弃四方皆蛮夷的自尊自大心态，重新审视自身文化。回望中国近现代的启蒙之路，可谓是曲折坎坷，直到今天，中国仍然在启蒙之路上蹒跚而行，前路险阻，以中国人口之众多，国民素质之参差，社会政治结构之复杂，成功与否，仍未可知。

五四运动点燃了中国启蒙的萤火之光，按李泽厚先生的说法，救亡最终压倒了启蒙，但是五四精神仍有其现实意义。事实上，人必需自己去思考，这就是康德所说“不经他人引导，摆脱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没有一个学者可以规划启蒙的发展，因为所谓“规划”面临现实和变数，往往是失效的、被动的。文化精英们在谈论“国民性”时，始终摆脱不了一种说教的姿态，实际上，潜意识里仍然把自己归属于某一类权威，践行了一套“反启蒙的启蒙”。

纵观中国历史，因宗教而引发的冲突甚少，中国的教派之间除了文人式的相互批评和辩论之外，很少发生实质性冲突。相反，在西方历史上，各种宗教斗争一直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不仅在基督教世界，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由于宗教所引发的冲突也屡见不鲜，包括今天仍然战火不断的中东地区。宗教问题从来不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旋律，略读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起义。如果尚有一口饭吃，只要能够生存下去，不管谁做皇帝，农民都愿意安居乐业。占庞大人口基数的农民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群体，在不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为了“虚无缥缈”的真理献身。

儒家三纲五常的理论把个人固化在家庭血缘关系中，捆绑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代之以集体意识。推而广之，到社会，到国家。所谓善恶同源，一方面它使传统社会笼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给人以稳定感、安全感，另一方面又大大阻碍了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提出的“精神性断乳”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抛弃，而是对传统文化功能和社会角色的重新估量与再创造。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可以应付以自然经济为主、生产方式单一的社会，但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和国家面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精金美玉的一面，但面对现代化带来的挑战时，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几乎处于一种失效状态。

#### 四、结语、

16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人利玛窦采取“合儒排佛”的适应策略，在儒家学说和天主教义之间寻找共性和平衡点，使天主教暂时得到了中国社会的认可。18世纪，关于礼仪之争的问题引发了中西双方大规模的争论，结果罗马教廷颁布礼仪禁令，中国皇帝下达传教禁令。1793年英国使臣觐见乾隆，要求通商，被拒。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回溯历史，早在中国进入现代化以前，中西文化已经出现一种新旧杂陈、死活交错的样态，既有融合的势头，又有排斥的阻力。礼仪之争是一个极具研究意义的话题，其意义超越了礼仪风俗，伸探到中西文化底层。无论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还是“中国特色”，其本质都是试图使中国更好地屹立于全球化潮流中。从最初马可波罗描述中令人艳羡的东方大国到西方传教士眼中愚昧落后的国度，中国近几百年所走的路不可谓不坎坷。以

启蒙的视角重新审视礼仪之争不仅可以开拓思路，也为现代中国融入世界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历史借鉴。文化保守主义和抱残守缺的心态都不应被视为爱国的一种表现。如果中国不能自主地继续启蒙之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将受到外力强迫而再次陷入被动。迄今为止，中国的启蒙仍是一项未竟之事，诚如康德所言，我们生活在启蒙时代，而不是已经启蒙了的时代。

## English Title:

# Modern Enlightenment in China from the Chinese-Western Rites Controversy

Xiaoli HU, School of Arts, Wuhan University, email: 986102471@qq.com; tel:13697349649

**Abstract:** The Sino-Western Rites Controversy was a controversy sparked by the missionaries during their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The focus of the controversy is whether Chinese customs such as ancestor worship, Confucius worship and heavenly worship are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Catholic belief, and whether a policy of tolerance should be adopted in view of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Chinese customs. They argued fiercely and defended for their own positions, but in the end they failed to find a way to reconcile, as a result, both sides refused to compromise. The rite controversy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was a prelude to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t that time, China was still able to debate with them as an equal party and made corresponding moves to prohibit missionary work. After the Opium War, China lost the conditions for exercising its free will, and was simply carried along by the world trends. On the surface, the ritual controversy was a clash of religions and customs between two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impacts was limited to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believers, but it actually reflected deeper cultural issues. Chinese culture is a complete system independent of other cultures, with its own logic of operation, and when it meets with western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still maintains its traditional patterns, with a very distinctiv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Hidden behind the rites controversy is a broader conflict of cultural modes of thinking, and it is these irreconcilable factors that led to the obstruction of Chinese enlighten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study the deeper structur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way of thinking from the face of this rites controversy, and the inspiration brought by the collision of the two cultures, by which China's future path of enlightenment may be get inspired.

**Key words:** rites controversy; enlightenment; religion; culture; conflict

